

The Communication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Hong Kong's Poetry in the Former Period of Cold War Time

冷战初期台湾 与香港诗坛的交流与互动

刘奎 著

台湾研究系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海外借

The Communication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Hong Kong's Poetry in the Former Period of Cold War Time

冷战初期台湾 与香港诗坛的交流与互动

刘奎 著

台湾研究系列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六十年来台湾社会思潮的演进与人文学术的发展》（1950-2010）（项目编号：16ZD138）阶段性成果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初期台湾与香港诗坛的交流与互动 / 刘奎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108-6091-1

I. ①冷… II. ①刘… III. ①诗歌研究—文化交流—
香港、台湾—现代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8841号

冷战初期台湾与香港诗坛的交流与互动

作 者 刘 奎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
印 张 21.25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6091-1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瞩目于台湾与香港文学的链接处

——序刘奎《冷战初期台湾与香港诗坛的交流与互动》

朱双一

刘奎先生北大博士毕业后来到厦大台研院与笔者同袍共事仅两三年，如果说同事之间常会有“与有荣焉”感的话，我一直天经地义地认为他应会以我这个“老前辈”为傲。但事实却不断挑战我的这个想法，近来反而有了强烈的以他为荣的感觉。这感觉在先睹为快地阅读了这本书稿之后，就更为笃定和强烈了。这两三年来，他除了将博士论文付梓出版并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外，还拿出了这一本 20 多万字的新著，其崭露头角的学术快手身影，令人刮目相看。当然，速度快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学术著作的价值和意义，取决于它是否提供了新的理论，新的视野，新的角度，新的方法，新的资料，以及新的观点和看法。本书显然志不在纯粹的理论建构和演绎，但在其他许多方面，却都有令人啧啧称羡的表现。

首先，作者十分敏锐地抓住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和香港两地文坛（特别是现代诗人）之间的关联这么一个主轴，却不局限于此，在历史纵向上向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陆文坛追溯，空间横向上向东南亚华文文坛扩展。建立起这一广阔视野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对两地文学研究，特别是香港文学研究具有促进作用。总的说，大陆学界开展台港文学研究已有近 40 年历史，却基本上是台湾和香港文学“井水不犯河水”，至多只是局部、个案的关联，文学史著作要么各写各的，即使港台同写，也仅是机械拼凑，像这样将两地文学关系作为整本书的论述主轴的，还是首次。该书无论对于台湾文学史或香港文学史，都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特别是香港文学研究，尽管界内往往将台、港文学并称，但台湾文学研究已有相当的开展，香港文学研究相对而言却还比较滞后。

因此本书对于香港文学研究的促进作用会更大些。其二，由于作者用相当篇幅发掘和描述两地文坛与此前中国现代文坛各方面的密切关联——包括现代主义、人文主义乃至左翼文学、传统诗文创作等等——由此揭示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香港两地的文学，并非凭空而来，实乃五四以降中国现代文坛的脉络延续，从而对于两地文学有了一个精准的基本定位。笔者也曾致力于两岸文学关系的研究，并认为由于语境的差异，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某些思潮脉络（如现代主义）在当代大陆其势不彰，或断续不整，却在台湾得以延续。本书作者与笔者可说“所见略同”，但他却能从台湾扩大到港、台，特别是能以更为充足的论据、更为翔实的论证加以阐释和证明，让我内心折服和快慰。

其次，本书选题和问题意识的确立，既受到刘以鬯 1984 年所写《三十年来香港与台湾在文学上的相互联系》一文的启发，更因作者在爬梳台湾大型文学期刊《联合文学》时，看到了当年张爱玲受雇于美新处翻译反共小说《荻村传》之事，由此了解到美国的“文化冷战”政策在当时港台两地文坛发挥的重要作用。作者因此将港台两地的文学关系放置于世界冷战、中国内战这么一个特殊的时空背景下加以考察。所谓“双战”架构及其意识形态本是台湾作家陈映真对当代台湾社会、思想结构特征的一种描述，近年来学界对于中情局、美新处等所主导的“文化冷战”也有了进一步的考究和认知。台湾、香港文坛及它们之间产生的诸多现象和问题，只有放到这一背景中，才能看清其内在的关联和脉络。当年香港、台湾不少报刊以及作家创作（包括翻译），其背后“金主”就是美新处。当然，指出这一点并非要对相关作家加以追究，而是要深入了解许多事情发生的背后原因。

尽管港、台文学同受“文化冷战”影响，但作者并不停留于展现两地之同，而更着力于发现两地之异。如香港体现出相对的多元，也较快进入都市情境，因此都市文学较早出现；而处于内战戒严体制下的台湾不可能如此“多元”，比起香港，它更多一些“热战”的成分，因此诗人更多以“战争”为题材。又如，由于 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处于白色恐怖下，一时杜绝了左翼文学公开传播的可能性；而香港的情况却比较微妙，成为一个“左”、右以及犹豫观望的“第三种人”聚集共存的地方，因此左翼文学文化在香港反而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如“保钓”后的 20 世纪 70 年代）兴盛一时。在这种比较视野下，就使香港、台湾文学在冷战背景下之特殊样貌的论述，更为饱满而丰富。

其三，本书又一明显特点是善于挖掘、搜寻长期湮没于故纸堆中的第一手

资料，其大多论述都建立于翔实资料的基础上。作者往往抓住一个未必起眼的线索，甚至仅是蛛丝马迹，却能顺藤摸瓜，最终收获了非常可观的发现。与一些以挖掘资料、展示资料见长的学者有所不同的是，作者并非为资料而资料，而是通过这些资料，发现问题以及许多具有研究价值的作家作品。最近界内有学者呼吁研究香港文学应从报刊资料的爬梳整理入手，诚为识者之见，而刘奎先生却已先走了一步。

举例说来，有些刊物像香港的《中国学生周报》《今日世界》《文艺新潮》，台湾的《现代诗》《畅流》等，虽然早已有人研究，但它们数量大内容杂，对其梳理需有耐心和功力；而像《新希望周刊》《新思潮》《好望角》等，则属于作者的新发现。在资料的梳理中，刘奎有了许多“开辟荆榛”般的成果，如他发掘了易君左在港台的艺文活动，并以易氏为中心，描绘出港台传统文人圈的聚散情景。易君左是乙未年反对清廷割台的著名爱国志士易顺鼎的儿子，他在时间上连接着传统和现代，地域上横跨香港、台湾乃至东南亚，艺术门类上文学和书画兼擅，职业上创作和编辑并举，这多重身份使他交游极广，能在港台文化圈中起到一个聚拢粘合作用。作者由此勾勒出谢冰莹、钱歌川、左舜生等新派文化人和郑水心、梁寒操、陈其采、熊式辉等传统旧派文人在港台之间的互动轨迹。

又如，20世纪50年代港台文坛一位颇为活跃的作者梁文星，其本名吴兴华，乃40年代中国现代文坛的知名诗人，他的“真身”其实仍在北京，“梁文星”乃宋淇为在港台发表好友诗作而另起的笔名。这样的“影子诗人”在文学史上颇为奇特，值得一书。尽管梁文星就是吴兴华此前已由贺麦晓、张泉等学者发现，但刘奎发掘了更大量的原始资料，据此提出了与前者有所不同的观点，力求从港台当时的文化思潮如新人文主义、新批评等语境来讨论和阐发，其文学史价值和意义就更能得到凸显。

其四，在这一本以挖掘资料、出土长期被湮没的港台作家作品见长的著作中，作者并没有放松理论的观照。理论带给作者睿智的视野和眼界，一些理论的恰到好处的运用，使作者对文学现象的观察和阐释，达到应有的深度。最明显的例子见于第五章。作者引入了“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的概念：“政治文化”指“某种政治形态或诉求在文化领域的表达”，“文化政治”则指“以文化的方式达到政治的目的”，二者都说明了整体上文学并无法与政治脱离关系，所谓纯之又纯的“纯文学”是很难找到的，这在20世纪的港台文学中表现得格

外明显。作者抓住了“遗民”这个指称，指出对于遭受乙未之厄的台湾人而言，他们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前朝“遗留”之民，同时还是被清朝“遗弃”之民。这时“国”之有无去存，实关系着台湾人的身家性命、是当自由人还是当奴隶的分际，这使他们有着难以更改和消弭的民族意识和祖国认同，被遗弃的处境使他们感到格外的痛苦和委屈，甚至有“凄凉怨怼的感觉”。作者深刻地指出：这一点甚至也是后来产生“孤儿意识”的原因之一。1911年梁启超访台时，能够体会到台湾同胞的这种委屈而加以抚慰，发出了“汉家故是负珠崖”“珠崖一掷谁当惜”的感叹，同时又亲身体会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的种种痛苦并诉诸笔端，其“万死一询诸父老，岂缘汉节始沾衣”“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等诗句，才能“抓到了父老内心的痒处”，轰动一时，不胫而走，传遍全台各个角落。

进一步，作者还分析这种由文人间相互酬唱而形成某种“文化共同体”的原因和功能。当其时，日警严密防控，“隔墙有耳”，梁启超无法发表演讲，只好用诗词唱和的方式，与台湾文人交流感情，互诉衷肠，这里“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作者指出：“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文人修楔、诗词酬答不仅是遗民延续斯文的方式，它本身也形成了一个话语与情感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现象后来在港台文坛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如冷战时期的台湾，不仅杜绝与大陆文坛来往，甚至一度也限制香港刊物的进入，然而两地的文人和文艺作家，却以梁寒操、易君左等人以及纪弦《现代诗》、马朗《文艺新潮》等刊物为桥梁，“让这两个隔海相望的岛屿暂时克服了空间上的障碍而成为了一个文化圈”。这一点对当下仍深具借鉴意义：尽管这些人具有不同的背景、想法和诉求，但他们“对对方都充满了‘了解之同情’，这种交往方式形成的是某种‘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又译主体间性），这种基于历史交错、情感理解与现实关怀的新的主体形式，为两岸从误解走向认同提供了历史的借鉴与未来的前景。”我觉得，以我从事台湾文学研究30多年的所见所闻，这样的论述颇具创新性，是用新理论、新角度阐释台湾、香港文学及其与大陆文学关系的成功范例。

最后，还得谈谈我所认知的作者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可观成绩的原因。仅就其主观方面来说，至少有这样两个原因。一是作者有着比较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知识积累。其博士论文以《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为题，但观照面广及抗战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坛，他自己也略带谦虚地说明道：“笔者因

此前对抗战时期重庆文化人有所研究，故对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大陆文化人的政治选择和后续经历颇感兴趣”，像梁文星 / 吴兴华资料的搜罗和阐发，纪弦与马朗的旧友关系的梳理，几乎湮没无闻的重要文化人易君左的发掘，都与其博士阶段的学术积累有关。

另一则是作者万分的勤奋——说“万分”并不夸张——像他列出了《联合文学》将近 200 期中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文章目录，该刊每期 200 多页，这样作者等于处理了四万多页的内容。而香港《中国学生周报》则达千期以上。这样的工作量令人叹为观止，没有坚强毅力专心投入，是不可思议的。在我看来，两三年来作者成绩斐然，在别人还在以“先熟悉熟悉情况”为由在新的研究领域面前逡巡，不知何时才能“入门”时，他早已经是登堂入室，彰显行家气派。然而我听到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却是：“这几年白白浪费时间了”。这种嗜时如命的紧迫感，使他除了有时要照看刚一两岁的小女儿并其乐融融外，几乎抓住每一分钟都在工作。近年来，众多的年轻博士进入了台港文学研究领域。刘奎的成功经验，对于年轻学者如何快速地进入角色，显然具有启示意义。

刘奎嘱我为他的书稿写序，原本只是出于情面答应下来，心想大概写些应景式的鼓励话即可，后来却越读越有味，最终写成了带有学术性的严肃文字。虽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这“情理”就是，书稿本身富有学术性和创新性，序文自然不能与之全不搭配。当然，是否书中的妙处都被我说出来了？实在不敢说，但愿“虽不中，亦不远矣”，是为序。

目 录

朱双一序：瞩目于台湾与香港文学的链接处	1
绪 论	1
一、研究缘起	1
二、视野与观点	10
三、问题与脉络	17
第一章 文人交游与现代思潮	20
第一节 诗人交谊与文坛互动：纪弦（路易士）与香港关系考论	21
第二节 吴兴华与 20 世纪 50 年代台港的现代诗	34
第三节 交汇与重叠：《中国学生周报》上的“台湾文坛”	46
附：《中国学生周报》台湾作家作品目录	63
第二章 台湾与香港现代主义诗歌比较	93
第一节 翻译的政治：台港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译介及其差异	93
附：现代诗刊译介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统计	111
第二节 都会风景与殖民经验：冷战初期香港现代诗的几个母题	122
第三节 冷战中的热战：20 世纪 50 年代的台湾战争诗	142

第三章 编辑、刊物与文化场域的互涉	181
第一节 作为编辑的纪弦（路易士）	182
第二节 《中国学生周报》与冷战时期港台的学生文学与教育	194
第三节 上海、台北与香港：《新希望周刊》的三个阶段	207
第四章 港台传统文人圈的聚散：以易君左为中心	219
第一节 兼容新旧：易君左的文人圈	220
第二节 想象河山：易君左与 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的纪游写作	228
第三节 移 / 遗民：易君左与港台诗人的唱和交游	243
第五章 走向文化共同体：交往的文化政治	259
第一节 “遗民”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以梁启超 与台湾士大夫的诗词唱和为中心	260
第二节 幻象中的探寻：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港现代派诗人共同体	274
第三节 缝合断裂：20 世纪 80 年代台湾《联合文学》 所揭载的“现代文学”	290
附：《联合文学》所载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目录	301
结 论	312
参考文献	318
后 记	327

绪 论

一、研究缘起

选择冷战时期台港文坛交流的议题，有些偶然。之前在翻阅《联合文学》的时候，读到台湾《荻村传》作者陈纪滢的一篇回忆性文章《〈荻村传〉翻译始末》，该文与郑树森的《张爱玲·赖雅·布莱希特》、柯灵的《遥寄张爱玲》、丘彦明、王祯和的《张爱玲在台湾》一起，刊载于《联合文学》第29期的“张爱玲专卷”里。港、台是张迷的沃野，本以为该文也是忆旧抒情类，没想到读后却似乎看到了另一个张爱玲。该文透露了张爱玲在美国新闻处的支持下，翻译《荻村传》的过程：

曾经是台湾“美国新闻处”处长的麦加锡，当他还是曼谷美新处处长时，奉美国国务院命令要介绍中国文学，他便派了副处长来台北找我，问有人译了《荻村传》没有？我回答有。他表示美新处有意翻译这书，我道：“你们找饶大卫好了。”不久麦加锡及这位副处长同时调到香港美新处，就从亚洲基金会调出英千里先生译的《荻村传》原稿。

读完之后，美新处方面的意见是，英先生虽然把我小说中的土话全译出了，但是美国人读来还是太典雅，恐怕不合潮流，决定找人另译。

这时张爱玲女士在香港。她是河北丰润县人，祖父张佩纶是清朝的名臣。她的中英文都好，麦加锡处长就托她重译《荻村传》。最后一校的英译稿我读了，张爱玲不是逐字逐句的翻译，大部分是意译，但是并没有离开文字的基本骨干，整个文字就美国人而言，读起来是比英先生译的容易多了。

虽然美新处付给张爱玲一万多美金的翻译费，比英先生的多（这数

字是我听说的)。但是,张爱玲说,她喜欢《荻村传》才翻译的,不是为了钱。

.....

张爱玲重译的《荻村传》,终于在1959年由香港“霓虹出版社”出版了。这个出版社由梁寒操先生的夫人黎剑虹女士主持,背后是“美国新闻处”支持。前前后后一共印了七版,每版三千册。“美新处”把这些书分送给东南亚各国及世界上其他国家做为“反共”宣传。后来“美新处”不再支持“霓虹”,这个出版社,便在1964、1965年间停办了。^①

之所以长篇引述这段文字,是因这段话透露了很多信息。首先是如何评价中后期的张爱玲的问题,因为张爱玲在香港期间不仅创作了《赤地之恋》《秧歌》等小说,而且翻译了比较多的作品。从陈纪滢的回忆来看,至少她在香港期间的翻译是与“美新处”密切相关的。其次,是“美新处”这个机构在20世纪50年代台、港的文化活动,美国新闻处(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是美国新闻总署的海外支部,主要从事文化与宣传活动,是冷战时期美国在海外的主要文宣机构。该机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和香港,针对大陆,利用新闻、广播、出版等方式作了许多反向宣传活动,以此开展文化冷战。《荻村传》是台湾“反共”文学的代表作,因而“美新处”两度请人翻译,但这仅仅是“美新处”在亚洲开展文化冷战的冰山一角。第三方面是冷战时期港台文坛之间的交往与互动。1949年5月,台湾省政府主席颁发《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号》,宣布台湾进入戒严状态,随后又制定新闻出版方面的条文,查禁“左翼”书刊,限制绝大部分现代作家作品的出版,台湾出版界与其他地区之间的沟通也受到影响,当时尚处于敌对状态的两岸之间自不必言,香港地区的很多刊物也无法进入台湾市场,不过台港两地文坛之间的交往依旧频繁,梁寒操、黎剑虹夫妇虽然留在香港,但他们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显得错综复杂。这些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让我意识到冷战期间港台两地文坛交流的复杂性。

而笔者之所以想集中探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港台诗坛的交往,除了背景的复杂性以外,还在于互动形式的多样性和交往本身的问题性。笔者因此前对抗战时期重庆文化人有所研究,故对20世纪四五十年代大陆文化人的政治选择和

^① 陈纪滢:《〈荻村传〉翻译始末》,《联合文学》,1987年总第29期。

后续经历颇感兴趣。1948年前后，国民党败象已显，部分不愿留在解放区的文化人开始选择后路，当时局势尚不明朗，文化人的退路并非只有台湾，正如易君左的回忆：

当时政府是指定了以下三个飞往的地点：一、广州，二、重庆，三、台湾，可以自由选择其一。我们和星五熟商的结果：决飞台湾。因为觉得广州的局势看来并不能保持长久，迟早是会撤退的。重庆呢？我们在抗战时已住了整整八九年，住得太腻了，好不容易出了川，现在又再回去，似乎可以不必，可是那位四川最好的朋友尹祖光却极力怂恿我们同回重庆，虽是好意，无法接受。台湾则是我们政府新迁的地方，今后“反攻复国”的惟一基地一定是这座宝岛，我们既是中华民国一份〔分〕子，就应该跟随政府的行动，而且我们都没有到过台湾，今天有这个机会，更应该前往。^①

回忆录难免带一定的后设倾向，故当初的选择看起来异常坚定，但从尹祖光的选择来看，除台湾以外，南方的广州和曾为抗战基地的重庆都在选择之列。广州毗邻香港，抗战时期很多知识分子由此进入香港，重庆等西南地区当时也尚在国民政府的掌握之中。而与这批要南下的知识分子相反，很多滞留香港的左翼作家和中间派作家，在1948年底选择北上，准备参加由共产党组织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随着他们的离开，香港的文化市场也随之呈现巨大的真空，亟须新的文化人前来填补，这为部分文化人南下也提供了条件。

赴港与赴台并非仅仅是地域不同，还关系到政治立场的抉择，因而逃往何处这对于当时的文化人来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相对而言，留在大陆与赴台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政治去就较为明确的，而赴港的知识分子则不一样。像梁寒操夫妇这样，曾在国民政府身居高位，或此前颇有影响力的文化人，1949年后不赴台而选择赴港的人不少，当时钱穆所主持的新亚书院就汇聚不少此类人物；还有张发奎等“第三种势力”，他们既不愿留在大陆，同时也反对蒋介石，而主张走第三条道路。此外值得关注的是青年党，20世纪40年代它曾经是国、共之外的第一大党，1949年之后大部分成员都南下香港。青年党在港时期的立场，与第三种势力很接近，部分人员也是该势力的圈中人。其他文化人也有部分持此态度，如燕归来等，也前往香港，他们在香港组建友联出版社，出版了《祖国》周刊、《中国学生周报》等刊物。部分新文化人也选择南下，并

^① 易君左：《烽火夕阳红》，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版，第171页。

成为此后香港文坛的代表性作家，如徐訏、马朗等便是如此。

1949年之后，台湾“戒严”，港台两地的文化交流受到一定的阻碍，但这主要是针对书籍的出版和刊物的发行而言，文化人的行动并未受到限制，当时不少作家常往来于港台之间，他们并未因赴台或赴港，就停止他们流亡的生涯。如易君左1948年赴台，在台湾办刊物、写作，甚至购置了房产，但在台仅仅九个月便前往香港，十八年后才再度回台；夏济安、白先勇等则是先赴港，然后赴台；写作《半下流社会》的赵滋藩，则是因触怒香港当局而被遣送往台湾；此外，台湾为了获得海外华侨的认同和支持，积极开展侨教工作，为侨生赴台就学制定了十分优惠的政策，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不少香港学生赴台就读，如刘绍铭、叶维廉、李欧梵等都由港赴台，读台大外文系，并且成为沟通两地现代主义文艺的中介。这类跨地域流动的作家很多，笔者略作统计，至少还有以下香港作家曾在台湾读书：

朱韵成，台湾成功大学；
蔡炎培，台湾中兴大学农学院；
戴天，台湾大学；
王敬羲，台湾师范大学外文系，梁实秋弟子；
温健骊，台湾政治大学外文系；
张锴，笔名翱翔，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
黄德伟，台湾大学外文系；
卢文敏，台湾师范大学；
朱琄，在台湾读大学，后嫁蔡炎培；
刘国坚，笔名刘戈、白垚，台湾大学历史系；
郑树森，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

.....

这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生，部分日后成为较为知名的作家或学者，是沟通台湾和香港文坛的实践者，《香港新诗发展史》如此描述这些学生的活动过程：

这批1930、1940年代出生的诗人后来大多成长为香港诗坛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台湾求学的经历中多有与诗歌相关的文学活动，并且实际地参与到诗歌实践活动中；台湾现代派风气日盛，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诗歌学习氛围；大学校园里的年轻学子易于接受这些较为新潮的诗歌流派，学习

新诗创作，参加或者组织各类文学社团，创办诗社所属的诗刊。^①

侨生是两地文学交流的受益者，同时他们又反过来促进两地文坛的交流，如郑树森在政大念书期间就结识了痖弦，后来成为痖弦旗下报刊的重要作者：

我与树森认识很早，远在他在政大念书的时候，我们就在尉天骢的介绍之下论交，一晃，也快二十五年了，我这二十多年全副精神几乎都奉献在报刊编辑事业上，而树森的翻译评论多半发表在我编的刊物上，他是作者，我是编者，二人配合无间创造佳绩无数，堪称“最佳拍档”，也是外人眼中的“同伙”“死党”。郑树森政大快毕业时第一个专栏“风向球”，就开始在一九七〇年元月第三十二卷第一期的《幼狮文艺》上。^②

郑树森后来留学美国，在台湾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时代风潮中，成为痖弦的重要助力。

从台湾到香港就读的学生不多，但前往香港的文化人则不少。知名者如余光中、钟玲、施叔青等，他们或在香港执教，或在香港定居，成为香港文坛的重要参与者。笔者曾根据王剑丛所编《香港作家传略》为线索，^③对其中涉及港台迁移或相互影响的香港作家略作整理，由此可窥一斑：

方娥真，1954年生于马来西亚，祖籍广东潮阳，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台湾天狼星诗社绿林分社负责人及诗刊主编，是天狼星诗社“十指连心”会会员，曾获台湾新诗学会1976年度诗歌创作奖，20世纪70年代末移居香港。

尹怀文，在台湾长大，台湾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主修美术工艺。毕业后赴港，在邵氏影片公司当配音员。曾与小思、陆离等在《星岛日报》写“七好文集”专栏，杂文收《七好文集》《七好新文集》。

王敬羲，江苏人，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赴美留学，曾长期主持香港文艺书屋，很多作品在台湾出版，如《七星寮》《暴雨骤来》等。

司马长风，本名胡灵云，黑龙江人，1922年生，1949年7月赴台湾基隆，后转往香港，曾任职于友联出版社，很多作品在台湾印行，如《花弄影》《濡沫集》《旧梦新痕》《吉卜赛的乡愁》等。

① 犁青主编：《香港新诗发展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8页。

② 痖弦：《国际文坛极目——读郑树森〈与世界文坛对话〉志感》，载郑树森：《与世界文坛对话》，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3页。

③ 王剑丛：《香港作家传略》，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叶妮娜，生于香港，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作品散见《香港文艺》《台湾联合报》。

阮朗，苏州太湖人，1919年生，抗战时期曾创办三一出版社，1946年进上海《大公报》，有时协助台湾分管的电讯和通讯工作，1947年被派往台北，建立《大公报》分馆，任报社驻台北分馆主任。1949年《大公报》被国民党封闭，即到香港《大公报》任职。1959年《新晚报》创办，任编辑，开始编辑与写稿生涯。用“高山客”笔名写《台湾之窗》，有《台湾事件》《草山残梦》。

西茜凰，本名黄绮萤，1952年生于汕头，两岁移居香港，创作深受余光中影响。

华莎，1933年生于新加坡，后到大陆，1975年赴港，作品有《母女浪游中国》《我的台湾之旅》。

余光中，1948年随父迁居香港，1949年5月到台湾，1975年至1983年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在港期间出版了六部作品。^①

严沁，生于上海，在台湾长大，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嫁给台大一位香港侨生，后赴港，代表作如《云上云上》，写抗日故事。她每天要为香港两本周刊写杂文，为两本半月刊、两份报纸、台湾一本杂志写小说，并为香港电台主持一个广播节目。

李英豪，《好望角》文艺半月刊主编，台湾《创世纪》诗刊香港编委。曾获《笠》诗刊第一届诗评论奖，在台出版《批评的视角》。

肖钢，1929年生于北京，1949年自上海去台湾，曾任台北《自立晚报》《大华晚报》编辑，并从事电影剧本和话剧剧本的编写。在台湾出版短篇小说集《街檐》《方虹》《哀歌》，长篇小说《百家姓》；1961年7月赴港，任邵氏影业公司编剧。

林适存，1914生于湖南湘乡，1949年旅居香港，后赴台湾，任《中华日报》副刊主编，1959年曾获台湾文学类文艺奖金。

林语堂，1966年回台湾，1976年病逝香港。

林太乙，林语堂之女，后定居香港，但作品多在台湾发表。

^① 按：据朱双一考证，余光中是1949年二三月份来厦门，1949年赴港。参考夏莞（朱双一）：《余光中在厦门的文学活动》，《厦门日报》，1987年9月18日；朱双一：《余光中早年在厦门的若干佚诗和佚文》，香港《现代中文文学研究》，第3期，1995年6月；等。

梁钰文，幼时居香港，后去北京，“文革”后重回香港。1979、1980获台湾《联合报》小说奖，《芒果的滋味》写大陆“反右”“文革”等历史。

林以亮，原名宋淇（宋春舫之子），燕京大学毕业，后迁居香港，作品多在台湾发表，曾在台出版《林以亮诗话》。

郑树森，厦门人，笔名郑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毕业，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博士，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中文系，曾居留台湾，任《文学季刊》《现代文学》编辑。

胡菊人，台湾报人傅朝枢将资金移往香港办《中报》，胡菊人辞掉《明报月刊》职务，任《中报》总编辑。

施叔青，台湾人，1978年赴港。

钟玲，1945年生于重庆，1949年迁台，东海大学外语系毕业，1977年与香港著名导演胡金铨结婚，迁居香港，1982年起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

思果，1918年生于江苏镇江，原名蔡濯堂，后赴港，大多时间居住香港，文章和著作多在台湾发表。

南宮搏，原名马彬，有笔名马汉岳、史剑等，1949年移居香港，写历史小说，很多作品在台湾出版。

赵滋藩，原名赵滋蕃，祖籍湖南，1924年生于德国，1949年赴港，1964年被香港当局遣送往台湾。

徐訏，1908年生于浙江慈溪，北大哲学系毕业，1950年赴港，在台出版作品。

倪匡，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的科幻小说进入台湾文坛，台湾电视台把他的小说拍成电视剧，还聘请他做监制。

黄维樑，1947年生，1969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诗评发表于台湾、内地等。

董桥，福建晋江人，台湾成功大学毕业后赴英留学，1980年继胡菊人任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

蒋芸，江苏吴县人，台北政治大学中文系毕业，20世纪60年代赴港。

戴天，1937年生于毛里求斯，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爱荷华大学硕士，70年代旅居香港，在《信报》写专栏，在美新处当编辑兼出版顾问。被称为香港文坛的孟尝君，与台湾和海外作家交往颇多，有